

格萨尔研究论集

◆ 王沂暖 著

现代中国藏学文库



中国藏学出版社

【现代中国藏学文库】

主 编 拉巴平措

格萨尔研究论集

王沂暖 著

中国藏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格萨尔研究论集/王沂暖著. —北京: 中国藏学出版社, 2017. 3

ISBN 978 - 7 - 80253 - 960 - 0

I. ①格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《格萨尔》—诗歌研究—文集
IV. ①I207.914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4851 号

格萨尔研究论集

王沂暖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
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15
字 数 200 千字
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253 - 960 - 0/I · 157
定 价 32.00 元

图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

E-mail: dfhw64892902@126.com 电话: 010 - 64892902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《现代中国藏学文库》总序

中国是藏学的故乡。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,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。这些正是藏学研究产生、发展的最根本条件,也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源泉。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这门人文社会科学,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。为了展示中国藏学研究的成果,加强同世界同行的学术交流,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,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,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,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《现代中国藏学文库》丛书,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:中国藏学家(包括港澳台学者)的学术专著;具有重要价值的藏学文献(包括现代学者辑录的历史文献);译成汉文的藏文学学术名著;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论文(对于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酌情予以收录)。所有收入的论著,均以学术价值为唯一衡量标准,文学作品、游记、通俗读物等暂不收录。作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,我们将把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。我们期望得到海内外藏学家的大力支持。

中国藏学出版社

2002年10月

出版说明

王沂暖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藏学家，长期致力于格萨尔史诗的翻译和研究，成绩斐然，被称之为格萨尔研究泰斗。王沂暖先生生前发表的论文散见于各种刊物，未能结集出版。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的坚赞才让研究员等人，对王沂暖先生的论文进行了搜集、整理和汇编，形成王沂暖《格萨尔研究论集》一稿。此工作得到了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——西北民族文献研究基地2012开放项目的资助。现由中国藏学出版社纳入“现代中国藏学文库”，对书稿做了进一步的编辑、校对。2014年，主编坚赞才让研究员一病不起，英年早逝，不由令人扼腕叹息！在《格萨尔研究论集》出版之际，略缀数语，以为说明，并深切怀念王沂暖先生和坚赞才让研究员。

中国藏学出版社

2017年2月8日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自 述 | (1) |
| 《格萨尔王传》中的格萨尔 | (17) |
| 蒙古文北京本《格斯尔传》读后记 | (28) |
| 藏族长篇史诗《格萨尔王传》 | (36) |
| 卷帙浩繁的长篇英雄史诗《格萨尔王传》 | (60) |
| 关于藏族《格萨尔王传》的部数与诗行 ——第三次不完全的统计 | (103) |
| 蒙古文《岭格斯尔》的翻译与藏文原本 | (134) |
| 《格萨尔学集成》一书的序言 | (171) |
| 格萨尔与岭 | (178) |
| 《雄狮魂》序 | (186) |
| 格萨尔与敦煌 | (189) |
| 藏族史诗《格萨尔王传》 | (194) |
| 关于藏文《格萨尔王传》的分章本 | (205) |
| 我的两点看法 | (221) |
| 我对《格萨尔》的一些浅见 | (224) |
| 《格萨尔论要》序 | (230) |

自述

王沂暖

农历丙午马年腊月初十（公元1907年1月23日），我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县的一个只有四户人家的小农村。吉林县是现在九台县的前身，九台是吉林县以后划分出来的一个县。这个小农村本无村名，它东靠二道林子，西临石头嘴子，北面为八台。它处在这三个屯子的中间，因它没有村名，以前借二道林子为本村的名称，有时也称为八台。解放后才定名为石头嘴子屯。

我家那时是住在小农村的最西边，单门独院，与其他三家隔有一亩地的距离。家的四周插有柞木树干的围墙，上房三间，左右配房也是三小间，东边三小间磨房，西面三小间，两间放粮食杂物，留着一间为亲戚来往的住房。正房后边是一个半圆形的后院，外围种的是杨柳，其间种有几株梨树，几株李子树，还有两棵樱桃、一棵山楂树。我幼小时，多半在这个后园嬉游，很少外出。果子熟时，摘些果子吃，回忆起来，有些事情已经忘记，只记得那时的心情非常快乐，外边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。我有五个姐姐，一个哥哥，我最小，哥哥比我长四岁，姐姐都岁数大，玩耍时，我总是单人独马不与人合群。我七八岁时的事我记得最清楚，我家每年都喂两头猪，一头喂肥了年终杀了过年，一头留下来年长大过年再宰杀，这时，放猪的任务由我来承担。我家西面偏下的地方有一块小柳林，那里也有草地，我把猪尾巴用小绳拴在一起，赶到草地放牧。那里的柳树不知是什么品种，树的叶儿

吃到口中酸甜可口。我天天放猪还真对猪有些情感，过年杀猪时我竟为猪的死流下了泪，真是幼稚可笑，足见我的无知。我那时的心境，好像天下太平，我一无所事，回忆起来真是最安适的快乐生活。

九岁那年冬天，我才第一次进入乡塾读书，乡塾的塾师是我父亲王连三。父亲名连三，字子元，念过书，却未入过学，他能诗，也懂韵律，字写得也工整，且能拉琴唱梆子腔。我入学首先当然是读三字经、百家姓，再读四子书，记忆力较强，读书觉得有趣味，未感觉过枯燥。大概在乡塾读到十五岁，我上二道沟高小读了一年。校长姓杨，是清朝秀才，文笔很好，我也受益，作文常得好评，记得他评语有“老树着花无丑枝”的句子，我很欣赏这个句子，所以至今未忘。高小读了一年后，父亲又把我送到一位宋老先生的乡塾，据说他很有文名，但未中过举。他的一个儿子很会写字，我也受了一点影响，学着练字，但我无书法天赋，所以未练出来书法。在那里读约一年半，在十七岁时，我父亲让我去吉林考学，我考了吉林一师，因为师范公费花钱少。读到十九岁时，省上法政专科学校与各中学在一起，举行会考，我考个特等第一名，教育厅奖我五十元永吉大洋，省长叫王维宙的奖我三十元。试题作文题有二，一为汉武帝论，一为论学校教育，还有一道诗题松江夜泛，限三小时交卷，我都作了，王省长在我卷子上批有文章气势浩瀚，诗亦有东坡赤壁之慨。教育厅长于慕忱让我拜他为师，这时已会写诗，不过初学写作而已。我的诗集上有《忆江南游龙潭山》，即是这时写的，论周岁那时正十七岁。

我在一师读了四个年头，那时有一位国文先生叫李一真，他很喜欢我。他崇奉孔子，尤爱明末大儒刘宗周。明儒学案中有刘宗周的蕺山学案，蕺山是他的别号。他学宗慎独，因此我也爱读蕺山学案，更喜欢他的慎独学说。慎独之说，出于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。莫现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，不愧于屋漏，内省不疚，这便是慎独之实质。我从此亦以慎独自律，定了两句名

言为座右铭，曰：“必慎其独，行己有耻。”对于读过的四书五经，视之为珍宝，也为我做人要做个正人君子的心愿，奠定了基础。二十岁那年，我由一师转入长春二师，因为考试的关系我在全省出了名。当时二师改为新制六年，后三年为后期师范，我转入后期师范，在学历上缩短了两年，因为我家境不充裕，缩短两年不但减省了两年学费而且提前两年考大学。

毕业二师之第二年，我于春初二月即赴北京。北京各大学都是暑期招生，我早到北京半年，想的是入补习学校补习补习课程，以便应考。北京有个弘达学院，是专门为考生补习功课的。我入弘达补习数学与英文两门课程。到了暑期，我即报名考北京大学。我的后期师范证书可以考本科。北大为本科四年，预科两年，共六年。我报考时尚未拿到二师毕业证书，因为证书尚未发下来，我拿的是二师临时发的毕业证明书。考北大，证明书非毕业证书只准报考预科。报考预科分初试、复试，考两次。当时考北京大学报名人数多达三千多，初试取了二百名，我在其中，复试又减去四十名，只有一百六十人中考，我也勉强考上。入北京大学读了一个多月，北大本科又招插班生两名。这时我的二师毕业证书寄到了，我就拿着二师正式毕业证书报考北大本科。这次本科报考人数七十多名，也分初试、复试。初试我考中了，榜列第一名，初试只取四名。复试我又考中了，榜列仍是第一名，因此我从预科一跃而入了本科，这年是公元1927年夏秋之交，我又入了北大本科，学历提前了两年。这于我这个穷学生不无小补。我在学校生活很俭朴，也很艰苦，多半吃粗粮，如吃山东高桩馒头蘸点白糖或吃窝窝头，或自下挂面和酱油吃。一星期改善一次，到东安市场会元馆，有饺子和锅贴，或吃二十个饺子，或吃十个锅贴，只花八分钱或一角钱，前两年就是这样过的。我的费用比一般人少一半，一年只花一百五十元钱。那时又有了病——慢性痢疾，医生又说我肺门厚，当心肺病，于是我下决心减食、走路、晒太阳，自1929年起实行。每日不吃早饭，废止朝食，外出全步行，每日有太阳时即在北大小操场晒太阳。

课程我喜欢诗词，也兼听佛学课，因此对于佛学也产生了兴趣，常看梁漱溟的著作，对他颇有好感，就这样在北京度过了四年学习生活。1931年暑假毕业。真是不幸，毕业回吉林教中学，当年暑期爱人解令闲因肺病逝世。她二十岁与我结婚，那时我年十八。我们共同生活了八年之久，生有一男一女，她死时男五岁，女三岁。女儿不幸于她死亦死去，只余一男，现已六十余矣。

我回到吉林，妻死，不久即发生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。日寇逐渐占据了我的家乡东北三省。我当年教省女中，次年转教省男高中，至1935年4月才潜行逃出吉林，与我非常友好常在一起谈论国事的李光汉，系毓文中学校长，被日本人杀害。那时我已逃出一年，在东北中山中学教书，已由北京迁往南京，我前妻逝世又续娶赵澄玉，连生三男，一男因病误殇于南京。中默儿之夭折，是我之过，至今想起仍中夜不成寐，茹痛万分。

南京中山中学，校址在中华门外四十里之板桥镇，盖了几排平房，地势颇佳，距南京有铁路可通，非常方便，在南京只住了一年，“七·七”事变发生，日寇进攻上海，久未能下，寇兵乃绕道安徽广德，直接威胁南京。南京告急，教育部于11月19日急电中山中学，限三日内西迁。学校的学生租用帆船西去武汉，教师自便。我与同事宋君携眷乘京芜路到芜湖，意欲到芜湖再买舟西上。孰知当时撤退人多，去上游客轮过芜湖时均停在江中不靠江边码头，有人乘小船攀登客轮，坠入水者大有人在。余与宋君不敢冒险，在芜湖火车站露宿两夜。当时天公也不为人设想，竟下了大雪，寒风刺骨，露宿车站内非常寒冷。江船不靠岸，等了两天，无计可施。恰于其时有客轮英商德和轮，下驶向丹阳，停于岸边，吾与宋君合计冒险上船，意欲随船下驶，船终不会停留丹阳，必会回驶。上船且找到睡铺，由轮船供饭。开船下驶行至镇江，已闻炮声，客轮不再驶向丹阳，果然回头经南京而西去，沿途停靠，历三日而到武汉。吾二人携家眷各租赁竹楼半间，即于武昌，暂时落脚。沿途忧国怀乡，诗兴发作，所作独

多。到武昌不久，学生所乘之帆船始到，皆落脚武昌。学校负责人四出寻觅校址，在湖南湘乡永丰镇寻得一大宅门，院中土楼颇多，足容下西来学生而有余，不过光线很暗，院落深深。在此复课。余于该年五月十五日辞去教职，拟溯江入蜀。蜀中成都有一北大教师私立西陲文化院，友人王宁华在该校任秘书长，计划到成都，文化院新成立，或需人。到成都后托人向该校关说，大约迟两月余，始得入院。主要工作为汉藏经对照，取出词汇，拟编藏汉大辞典。院址在江汉路，我在苦竹林街觅得一大户偏房居住。不久日寇飞机来成都空袭，皮房街春熙路全被炸毁，江汉路、苦竹林与皮房街相距咫尺，文化院无法继续工作，乃于1939年春到距成都八十华里之崇庆县觅一祠堂，迁居此地。崇庆原名蜀州，杜工部陆放翁皆曾在此地留居，陆放翁之剑南诗抄多成于此地，工部东阁寄酬裴刺史名句“梅花一树垂垂发”，亦即成于此地，东阁在现在县衙中。

我在崇庆县前后共住了约三年半，这期间因为搜集辞典材料，于1940年曾远去西康，在贡嘎山康松扎寺院住了半年，康松扎是白教寺院，它是分寺，主寺则在贡嘎山腰。此地海拔四千公尺，山上积雪，四千公尺以下松林茂密。我们是盛夏去的，是六月中旬，那天夜晚即下一场大雪，真成为六月雪了。在此地只吃酥油糌粑，偶尔得到一点土豆，那真是吃来大开口味了。因为地势高，空气稀薄，住了六个月，我们的肤色都变成灰白，真是面无人色了。那里夏天凉爽，冬天冰雪载途，但不太冷也不太冻。我们是夏天到康松扎，离去时是1941年1月，重新回到崇庆。这时钱币贬值，百物飞涨，我每月收入只一百元，五口之家实难维持，无奈将五人伙食包给一家小餐馆，商定月初发薪资时提前交给他们九十五元伙食费，这样一百元钱只留下五元算作零用。至于孩子们生病感冒只好不看病、不吃药。也怪，孩子感冒时，挨着不看，他初次发烧七天，竟退了烧。再次感冒，发烧五天也退了烧。第三次感冒，发烧三天，也退了烧，以后竟不患感冒了。三个孩子患感冒，经过情况皆是如此。于是我认识到了一

个规律，人身有周期性抵抗力，锻炼出抵抗力，以后竟不患感冒了，这样也救济了我经济困难。又过了一年多，我们编的藏汉大辞典已经脱稿，当时经济困难，文化院已有断炊之虞，我因寻找生活出路辞去文化院工作，前往重庆谋生。到重庆恰好汉藏教理院欢迎我上山，在教理院任讲师。教理院只供教师生活，无有薪给，这时我家尚留在成都，一家四口生活困难，难乎为继，我不得不于1942年秋半离职，无有工作病卧在亲友家中，患的是秋季痢病，过了两个月才脱险。后经朋友介绍先进入农民银行开办的炼油厂，呆了约两个月，于1943年把我调进农行的信托处，这才算有了正式工作，我把家眷从成都接到重庆。因农行用实物发工资，免于冻馁之苦。由于我初到重庆，有时吃不上饭便买包谷两穗充饥，到农行后全家衣食有了保证，所以我在农行一直待了六年多，直至解放被接收为行人人员。我调信托处，当年又调农行总行总务处，在处长室管理文件，后因缮校组组长外调，又调我充任缮校组长。到1945年，西康康定办事处副主任出缺，因我喜爱藏文又把我调为康定办事处副主任，因此我有第二次入康之行，两度翻越二郎山。二郎山之险峻，为诸山所仅见，万丈悬崖，深不见底，原始森林，松柏老苍。当时汽车路虽已开通，但到处塌方无车行驶，只用滑竿代步，一日能走六十里。二郎山尽头是泸河、大渡河，过了大渡河即到瓦斯沟，过了瓦斯沟，即到康定。由雅安到康定全程走在横断山脉之万山丛中，行程五百里，全靠滑竿走过，真是艰险万分。第一次入康我沿路尽作的是诗，第二次在去康往返途中，尽写的是词。这种境界，现代诗人恐怕是很少见的，因为这个路程，现代也很少有人走过，我恐怕是第一个人吧！

第二次入康也是住了半年，我是六月从重庆起身，记得是七月初到康定。在康定半年中，因为我有农行工作，再未远行，每日坐小楼中，农行行址是一座小楼。我的饮食未跟行中人同吃，因为我喜欢吃糌粑，每日有酥油，或吃糌粑，或吃烧饼，用小锅加酥油炖豆腐，味极甘美。农行开门是早九点，我起得很早，一

洗完脸，就翻过直儿坡东去，翻越小坡来回两小时，真是悠悠岁月，不知有身外事矣。入康月余，8月15日即听到日寇无条件投降，十余年乱离流浪生活至此告一段落，因写下虞美人词一首曰：“威弧已射天狼死，佳讯传今夕。满城竹爆一声声，为看万人空巷底心情。十年琐尾真春梦，泪与狂欢并，秋风送我好还乡，漫卷诗书一舸下瞿塘。”当时庆贺祖国之最后胜利，思念家乡之十年别离，亟欲东归探亲，遂于1946年2月由康定东归。当时作有踏莎行一词：“万里投边，十年行脚，还家犹觉江郎早。天公对我也多情，迢迢相送朝阳皎。烹坝鱼肥，沙湾梨好，千峰为劝金樽倒，荡胸时下护山云，决眦已入归林鸟。”其欣喜还乡之情，跃然现于纸上。

我是未请假即离开康定的，到了重庆后，领导也并未指责我擅离职守，但于调去东北还乡之请，他们认为也是有道理的，阔别十年的故乡，骤然间得到胜利，急欲回乡探视，亦是人之常情，但是他们说东北尚不太平，归路恐难到家，我是吉林人，吉林情况更为复杂，劝我不必急于成行。我归意非常坚决，因为确知生母于1940年病故，但在来往乡信中父亲左目失明，已年过古稀，但尚健在，急于回去见父亲一面，以了十年思念之情。再三与总行领导说明，领导终于同意调我到辽宁沈阳分行，我离康定到重庆是1946年2月，在重庆请调回沈阳，是6月批准的，我于是即日奔走买船东下，当时重庆思归的人数太多了，有人迫不及待乘帆船起程，中途被江水吞没者，不计其数，我在江上看见不知有多少起覆舟丧身的人，尸体顺流而下，在秭归江滩上就浮有数十具，真是惨不忍睹。我很幸运，买到一艘登陆艇的船票，这艘登陆艇载有冯玉祥将军的护弹汽车，由六名士兵押运着。即系登陆艇，行起来平稳异常，不畏风浪，一路即到汉口。我即兴于船上写几首词，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：“还乡即可，今日伊谁骄似我。滚滚江涛，一榻中流偃卧高。蜀川孤岛，井底公孙天久小，直恁开怀，莽莽平原入目来。”（此词诗集漏收）此登陆艇本意只到武汉，但因艇上载有冯玉祥之汽车，汽车是送往

南京供冯玉祥将军使用的。因此护送汽车之士兵，再三交涉，艇上船长，始允许直开上海，行客去上海的纷纷补票。终于抵达上海，这是复原时的幸运遭遇。我到上海未停，即日购海上客轮北上，到了塘沽，由塘沽到了北京。到北京即刻打电报吉林故乡，询问父亲情况，电报竟能打通，但不幸的消息是在回电中得知父亲已于1945年日寇投降后不久即已与世长辞，竟不稍待，呜呼痛哉。

我于1940年慈母病逝时，曾有江原哭母诗十首，江原即崇庆，当时我在崇庆，其中一首：“燕台犹记送东还，短发萧萧两鬓斑。世乱更堪生死别，西风吹泪过榆关。”乱离十年，流亡在外，父母俱逝，真的生死分离了父母未得一面，一生之痛抱恨终天。回忆父母爱子之情，历历如在目前，这事只有记在日寇账上，夫复何言！在北京住了几天，即出关先到沈阳，当时沈阳分行政筹组四平街支行，行长、副理已定，只有下属各部门未派人，于是我被任命为四平街支行襄理，兼文书主任。文书主任即是总务主任，管理行内总务事宜。四平街是新开行，四平街政府，分给一套已被炮火打烂的房屋，去了需自己修缮，一切公私办公家具均需重新制作。我是文书主任，担子比较重，并且事事都与金钱发生关系，正是金子遇到试金石的时候了。我是孔子的信徒，平素以“必慎其独，行己有耻”自励，应如白莲出淤泥而不染。头一次修缮房子，需要招标，果然招标的人夜晚到我家，作夤夜之事来了。他们都是说你的标招给我，我可以分成若干的，这是公开秘密，你不要害怕。我说别人如何我不能管，我自己的为人是不能干这种分成的事，不是害怕不害怕，我根本不愿意这样做，你如想招标成功，就要压低标价，按你实际的情况出标价，不要计算分成的事，我是按照谁的标价低谁中标，不计其他。每个人我都这样应付走了。结果标价低的中标，因为各新开行的银行都搞修缮，我的修缮费花钱最少。当然房屋工程有大小之分，但我是一清如水的，问心无愧的。

于四平开行，除了修缮房屋之外，还有制作用具工程，如办

公桌、床铺、桌椅之类，都要备置，附近只有一家木匠铺。他家当时做十二家的用具，我让他少算钱，他说十二家相比，钱少了不好做，隐喻要像十二家一样才好做，最后他也提出提成的问题，足见总务经手人是多半有提成在内的。我说我不要提成，只要你降低价钱，我也不是让你赔，你压低造价，依然可赚钱，结果商妥，做的家具样子与其他十一家不同。这样才做出定论。他事后对我说，我做过多少活，没遇像你这样仔细的人。我说我就是不要提成，我与别人不同。办公用具制作之外，还有日常用煤问题，除做饭用煤，到冬季还有取暖用煤，别家常规是公家用哪个煤厂的煤，也给经手人送他自家用的煤。为避这个嫌疑，我给公家定用的煤是另一家，我家做饭取暖用的煤又是别一家，不混同在一起，免得有人怀疑。这些零碎小事，我都做到公私分明。但有一件较大的事情我仍然坚持不以权谋私，因此得避免一个意外事故。四平、公主岭是东北大豆生产地，也是大豆集散地。到冬季大豆上市，市场上购买大豆的粮栈纷纷兴起，他们冬季大豆价格便宜时囤积大豆，到来年夏秋之季大豆价格猛提，他们能得很大的盈利，大豆价格提的高时有时会赚一大半利润。但粮栈在冬季囤积大豆时，手中缺钱，他们就与银行互利互助，借到银行款项时，同时银行也接受他们的一些好处，这可能叫作互惠互利吧！农民银行那一年也发生了这种事情。粮栈向农行借款，管营业的、管出纳的等等，竟与粮栈携起手来，农行借给他们的钱，粮栈用一半囤积大豆，给经手借给他们钱的也囤积一半大豆，这样到来年售出时因为大豆涨价，经手人也获得无本得利的大好处。这种做法听说还不是个别银行，而带有普遍性。但是1946年到1947年形势大变，1946年冬季用这种办法存下的大豆，还未等到来年夏秋之季出售，还囤积在粮栈中时，时值四平街大战，国民党战将死守四平街，四平街大战打了一月之久，终被陈明仁守住，未获得解放，但大豆存于粮栈中，却遭受了炮火的洗礼，几乎全部损失，这就给互利互助的借款粮栈，与粮栈代银行某些有牵连的经手人，发生了麻烦和纠纷。这事被沈阳分行领导

知道，大肆批评，以后怎样结局我现在也记不清了。我未陷入其中，是因为我根本没有假公济私的邪念，保守决不作伪的清洁胸怀，为沈阳分行领导所赞许。我不但怀廉洁之心，也见于实行之中，至今犹觉得理得心安。

在四平街的一段工作，了解了管总务人的一些行动，已成为公开的秘密，深为痛恨，但我则我行我素，决不同流合污。四平街战役后，城市虽被陈明仁守住了，但城中已百孔千疮，到处一片废墟，四平农行也不例外房子已毁，无法办公。沈阳决定撤销四平支行，人员暂回沈阳。我也当然随之到沈阳居住。大约住了几个月，沈阳行又派我去锦西分理处当分理处主任。锦西地处锦州之西，与葫芦岛相距仅十三公里，是一个小县，除农行外还有一家交通银行。当时正值辽沈战役剧烈进行之中，一时也甚为紧张，迨辽沈战役结束，又有锦州之战，接着又有塔山之战，风风雨雨，人心浮动，农行总行甚至通电全国农行大小机构说锦西情况不明，要各地农行停止向锦西分理处进行汇兑业务。我于时心甚安定，把锦西所有物资账目，分批转送天津农行。我于此时，除照常营业外决不假公济私，另搞小动作，与行员警卫员严守岗位，把应提前送出之公物完全一批一批送往天津。塔山战役之后，锦州解放，国民党上级下令，命所有尚未解放之机构全部撤退，锦西分理处准备撤退。我集合员警，愿意撤退者一起撤退，不愿者可留下，结果有四五位行员愿意撤退。我们将传票及剩余物资全部带上汽轮，从锦西葫芦岛上船到山东长山岛，在长山岛停留一个月左右，未在青岛上岸，直开上海。这时上海农行总行发出一道通令，通令全国说锦西分理处主任王沂暖“心忠为行，应变有方”的奖励。我那时是坚持雇佣观点，一心为行，忠于蒋家王朝，认为食人之食者，忠人之事，对党尚未理解。这一通令，在以后1959年审干期间，被调查我历史的人员到上海总行调查发现了我的“心忠为行，应变有方”的档案，我解释说，我当时确为蒋家王朝效命，自己承认了这个事实，听凭组织处理，组织对这件事并未深究。